

D U S H

巴萨明 “我不想消失在黑暗中”

倪伟 书写城市

梁治平 学人社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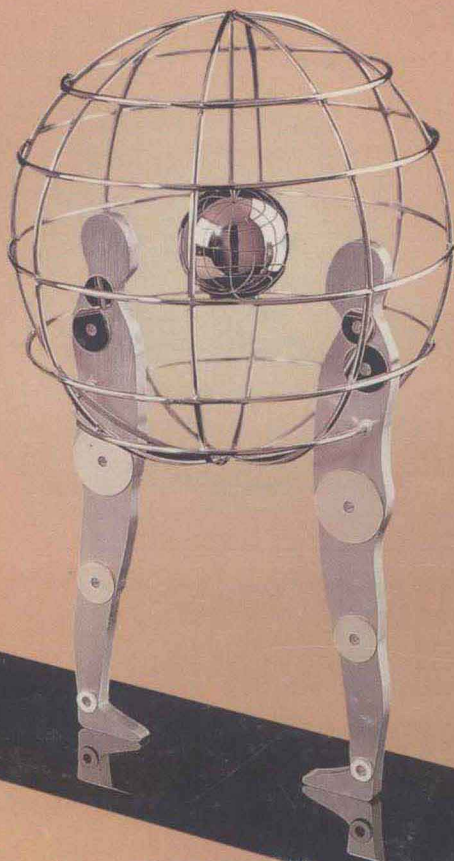
甘阳 遗留的思考

刘小枫 圣人的虚静

中 隐喻的漫水湾

瞿宛文 自由开放有利于经济发展？

瞿宛文 自由开放有利于经济发展？



读书

D U S H U

2002.3

- 倪 伟 书写城市—— 3
刘建梅 城市的多边故事—— 10
巴萨明 “我不想消失在黑暗中”—— 19
孙传钊 贫困的尺度—— 28



- 瞿宛文 自由开放有利于经济发展—— 36
甘 阳 遗留的思考—— 45



- 刘小枫 圣人的虚静—— 51
杨立青 关于伊藤虎丸的《鲁迅与日本人》—— 61



品书录—— 68

复杂的现实与复杂的思想(宣炳善)◆在废墟上收获什么(王培元)◆情
与理(王路)◆两个视野中的晚清(任珺)



- 冯 象 所多玛的末日—— 76
肖亮中 隐喻的漫水湾 田野札记—— 84

汪丁丁
郑秉文

宽带写作—— 90
股票·福利·经济制度—— 96



梁治平
陈映芳
张西明

学人社会—— 104
从青年文化的孩童化倾向说起—— 114
传媒帝国的诱惑—— 121



短长书—— 127

西部大开发的文化资源与发展模式(熊景明) ◆ 简单的道理,艰辛的历程(熊秉元) ◆ 谁想要世界一流大学(韩水法)



盛 洪
吴忠超

为天地立心—— 141
膜世界中的生灵—— 148



文事近录—— 152
读书平台—— 156
读书短札

新的光源(李庆西,9) ◆ 戏剧资本论(张鸣,18) ◆ 新问题?老问题!(鲍传江,51)

编辑手记—— 159

丁 聪
赵汀阳
陈四益文

漫 画—— 103

漫 画—— 151

诗画话 丁聪配画—— 封二

- 倪 伟 书写城市—— 3
 刘建梅 城市的多边故事—— 10
 巴萨明 “我不想消失在黑暗中”—— 19
 孙传钊 贫困的尺度—— 28



- 瞿宛文 自由开放有利于经济发展—— 36
 甘 阳 遗留的思考—— 45



- 刘小枫 圣人的虚静—— 51
 杨立青 关于伊藤虎丸的《鲁迅与日本人》—— 61



品书录—— 68

复杂的现实与复杂的思想(宣炳善)◆在废墟上收获什么(王培元)◆情
 与理(王路)◆两个视野中的晚清(任珺)



- 冯 象 所多玛的末日—— 76
 肖亮中 隐喻的漫水湾 田野札记—— 84

汪丁丁
郑秉文

宽带写作—— 90
股票·福利·经济制度—— 96



梁治平
陈映芳
张西明

学人社会—— 104
从青年文化的孩童化倾向说起—— 114
传媒帝国的诱惑—— 121



短长书—— 127

西部大开发的文化资源与发展模式(熊景明) ◆ 简单的道理,艰辛的历程(熊秉元) ◆ 谁想要世界一流大学(韩水法)



盛 洪
吴忠超

为天地立心—— 141
膜世界中的生灵—— 148



文事近录—— 152
读书平台—— 156
读书短札

新的光源(李庆西,9) ◆ 戏剧资本论(张鸣,18) ◆ 新问题?老问题!(鲍传江,51)

编辑手记—— 159

丁 聪
赵汀阳
陈四益文

漫 画—— 103
漫 画—— 151
诗画话 丁聪配画—— 封二

书写城市

倪伟

最近几年，城市作为一个社会结构单位在各种文化论述中越来越备受瞩目，城市的历史和文化传承不仅吸引了众多学者埋首研究，而且也给文化市场创造了一个卖点，《老北京》、《老上海》等“老”字号书籍纷纷出现，俨然造成了一股怀旧的潮流。从某种角度看，都市怀旧可说是信息时代社会结构的重大调整波及社会心理的一个结果。城市在信息/全球经济时代所占据的节点区位使其成为全球性的或是某一区域的经济和文化

中心，而在城市日益繁荣的同时，作为城市之腹地的广大乡村却是在无可避免地走向衰败。不仅是城市与乡村之间的鸿沟在越拉越大，而且作为全球化城市的大都会和作为区域中心的中小城市之间的距离也在逐渐拉大，这种结构性的断裂在一定程度上使得传统的“民族国家”框架很难再成为一个有效的思考单位，鉴于城市在重新组织社会意义上的重要作用，把它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论述单位，也是理所当然，所谓都市怀旧，放在这个背景中看，实际上是对城市经验和记忆的整理，它和各种关于城市的论述一起，共同塑造着我们对于城市的新的认知。

目前在学界流行的各种名目的“双城记”、“三城记”或是“N城记”，也理应看作是对上述结构性变动的知识反应。城市之间特别是分属于不同的经济、政治、文化实体的城市之间的横向比较，可以巧妙地避开意识形态的分歧所造成的障碍，而集中关注一些在信息/全球经济时代带有普遍性的城市问题。“三城记小说系列”显然也隐含有这一知识趣向。把上海、台北、香港三个城市近几年的文学创作放在一块比照，看看这三地作家是如何想像自己居住的城市，如何描绘身边变动的社会现实，如何捕捉隐藏在日常生活背后的重大问题，这确实饶有趣味。更重要的是，这种相互比照可以使我们看到全球化时代一些带有普遍性的

城市问题是如何在各个城市自身特殊的历史脉络中以及现实的政治、经济、文化条件下生长出来的,这种同中之异或许才是最具启发性的。

从这三本小说选集看,城市的快速发展所带来的生活方式、伦理价值观念的变化以及由此引发的个人身份认同的危机是三地作家共同关心的问题,如果再细分,则可以分化出更多的问题域,比如城市的历史是由谁以何种方式叙述的,对历史的叙述与当下生活的结合点究竟在哪里?城市中个人的生存体验是如何被定义、又是怎样被书写的?如何看待这种书写方式所隐含的文本政治?在性别、族群、空间归属等多重因素的牵扯下,个人身份认同的依据究竟落在何处?这些问题在这三本选集中都有不同程度的展现。

叙述历史当然并非为了求真,而应该源自对当下生活的思考和回应,叙述本身因而成为一种治疗性的书写行为。倘若以此标准衡量,被列为“上海卷”领衔之作的《孤岛岁月》恐怕还算不上成功之作。尽管如王安忆所说,这四章节选也许“保留了‘五四’知识分子式的健康、规矩和文雅”,其“写实的笔法”流露了日常生活中“平实,细致,活泼的人情味”,但从其平实的叙述中我们看不到历史与现实之间紧张纠结的关系,而非立足于对当下生活的深切关注,对历史的叙述就极可能流为老年人对逝去时光的絮絮叨叨的怀念。收在同一集子里的《暗香浮动》叙述的是“文革”期间上海一家小饮食店里发生的故事,夜夜在小店里欢聚狂饮的“酒鬼”几乎全都是“战斗”在工厂第一线的工人劳动者,他们粗鄙陋俗,满脑子下流念头,在他们身上哪还能看到在被修整得光鲜亮丽的正史中上海工人精明、能干、勤劳的形象?对历史的这种有意识的改写大概是这篇小说最有意思的地方了。然而仔细分析,这篇小说的叙述立场却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关于上海历史的主流叙述有着惊人的吻合。叙述者“我”是饮食店的小伙计,但“我”却对作为阶级兄弟的“酒鬼”们极其厌恶,觉得他们肮脏下流、野蛮无耻。惟一让“我”心仪的是阿玲,这个神秘的中年女子身上似乎染有旧上海的风尘,她与众不同的穿着打扮和举止神情,以及她的养狗和宠狗,都散发着与无产阶级格格不入的“资产阶级腐朽的生活方式”的气息,正是这种优雅而“堕落”的风韵让“我”为之神魂颠倒。酱油店小开和他的情人的故事也并非

全是闲笔，这个凄婉缠绵的爱情故事是饮食店小世界里的传奇，它寄托着当时人们对于旧上海的想像，然而这种想像却多半是色情化的，只有“我”把它想像成一个真挚的爱情故事，正是在这里，叙述者表明了其立场。显然，在他眼里，“文革”时期的上海是混乱、粗俗的，而过去的上海更文雅，更有诗意，也更见真情。掐掉中间近四十年的历史，把九十年代的上海与三四十年代的上海直接焊接在一起，这是当下流行的上海史叙述模式，这种强迫遗忘的机制即使是在《暗香浮动》这样的刻画那个被许多人认为“应该”遗忘的年代的作品中，也仍然有力地制约着小说的叙述。

同样是对城市历史的叙述，港台作家却展示了另外一种路向。《心情》顽强地把人们日渐淡忘的香港六七十年代的历史拉回到视野之中。在那个年代，支撑起香港社会的，是像“我”母亲那样整日在工厂流水线旁默默操劳的底层人，他们忍辱负重，用汗水和生命创造了香港的繁荣，然而如今他们已经老去，在华丽新世界中，他们是被遗忘的陌生人。那个年代，人们曾拥有纯朴可爱的日子，也会为了理想奋袂而起，在阳光灿烂的公园里淌洒鲜血，如今殷红的血迹早已被时光的急流冲刷得一干二净。那个时代连同质朴坚忍却又不乏烈性的人们都已远去，“社会上好像只有一类人了，他们一心一意地追逐着名利，名利成了这座城市最值钱的东西”。在此，对历史的纠缠不放构成了对当下生活的严厉批判。

在朱天心的《古都》里，历史与当下生活的纠结展示了更为复杂而深邃的内涵。正如王德威所说，这篇与川端康成的《古都》同名的小说虽然情节简单，却并不易读，小说中穿插了许多不同的文本和典故，除了川端康成的《古都》中的片段，还引用了《桃花源记》、《台湾通史序》、《诸罗县志》，以及劳伦斯、弗洛伊德、弗罗斯特（Robert Frost）、梭罗等人的诗文，这些互文文本的相互穿插叠映，使小说产生了多重意义指涉的可能性。中年女性“你”徜徉于京都和台北的街头，指认眼前风物，回首前尘往事。京都的风物历久而不变，台北“进步”的脚步却是如此匆遽，往日熟悉的城市已然面目全非，那些记录着“你”的青春欢笑の街巷、房舍和花木都被夷为平地，“你”的记忆像是无主之魂，空荡荡的，无所依

附。“你”的感伤怀旧还不能简单看成是对现代化的抗拒,“你”在捡拾个人记忆碎片的同时,也在重温这个美丽之岛的历史,个人记忆与集体历史经验绞合在一起,“你”在身份认同上的困惑实际上映照着更大范围的族群认同的危机。千重子的弃儿身份使对川端康成《古都》的引用成为某种隐喻,“清人得台,廷议欲墟其地”,“娑婆之洋,美丽之岛”成为“无主之地,无缘之岛”,从荷兰殖民时期到满清,再到日本殖民和国民党统治的时期乃至当下,台湾在各个时期的历史纷纷卷入,其间有着多少惨痛的记忆!桃花源与世隔绝,不知魏晋,然而即使置身其间,不也还有“这是哪里?”的惊问?更何况台湾又并非桃花源!因此,“你”陷入了时间和空间的双重失根之中,这种漂泊之感显然烙上了族群和家国政治的印记。在彷徨失据之中,书写成了自我拯救的手段。第二人称叙述建立了一种“你/我”的叙述框架,“你”与叙述者“我”是同一主体的分裂的两个部分,“我”是作为书写者的“你”,而“你”是被“我”审视的“我”。主体的分裂使叙述的推进变得异常凝重而艰难,却也蕴含着自我治愈的契机,在主体的自我凝视下,个体自我向历史敞开,在反思、质疑、探询之中努力重新确立主体的位置。这种决心自食的叙述方式是何等深切啊!反观大陆作家的作品,我们却发现其中的叙述主体几乎总是巍然不动的,他们或是高居于文本之外的冷眼旁观者,或是沉浸在个人哀乐之中的自恋狂,那样的叙述文本自然是封闭的,无力展现历史和现实之中的多重复杂性。

个体在城市中的生存体验历来是城市文学关注的重点,从“三城记”系列看,沪、港、台三城文学在对城市生存体验的捕捉、定义和归类方面,可谓各有特点。香港作家更多地表现了城市生活与人性相背离的荒谬可笑的一面,以及个人置身其间的孤独无力和紧张焦虑。《输水管森林》中像肠子一样弯弯曲曲缠在一起的输水管是城市的可怖的象征,《少言妙音》中的“我”用沉默乃至用血腥的暴力拒斥了整个世界,《耳朵》、《改头换脸之旅》、《铁轨上的掠影》等篇则反映了城市生活的卑微、空虚和疯狂,这些作品都染有浓重的荒诞色彩,在经过变形处理之后,城市生活充分暴露了其冷漠、异化的残酷面相。台北卷中的作品对个人与周遭环境的疏离虽然也不乏揭示,但是它们更专注于表现个人

在异化环境中对自我身份的感知，其中性别认同的问题显得尤其突出。《嚎叫》、《童女之舞》对同性恋者刻骨铭心的伤痛有很深入的表现，笔触细腻深切，散发着人性的温暖和光辉；《留白》、《洗》、《哀歌》则深入检讨了夫妻生活中情感的隔阂和荒凉“正常的”家庭似乎更像是束缚、戕害人性的囚笼。这两类作品从正反两个方面对传统的性别政治以及家庭伦理提出了质疑。《鱼骸》呈现了文化和家国认同上的困惑，专研甲骨文的学者“他”原是马来西亚华侨，背负着早年生活的创痛记忆，只身来到台湾求学，父母之邦、文化故国以及栖身之地的三重牵扯，使“他”陷入认同政治的复杂纠结中。性别身份与家国认同的问题在朱天心的《古都》里更是被完美地结合在一起，世纪末台北的身份认同问题遂获得了淋漓尽致的刻画。

反观上海卷，其中作品对城市生存体验的表现未免单薄了些，这固然与所收作品不只局限于城市题材有关，但作家想像力的贫弱和观念的僵化恐怕是更为深层的制约因素。陈丹燕的《女友间》把故事叙述得行云流水一般，那份从容和雅致是多数港台作家所无法企及的，然而问题也正出在这里。在小说极为流畅的叙述中，我们看不到叙述主体的内在紧张，那种因现实生活的复杂、含混而导致的思想上的困惑和艰涩，叙述主体的碎裂以及通过书写顽强寻找再造之途的痛苦的精神挣扎就更是无从得见。我们读到的是一个打磨得相当光滑精致的故事，尽管不乏令人叹赏的细节，却仍然没有摆脱“道德—欲望”的陈旧模式。故事的发展几乎就是作者潜在的伦理道德观念的逻辑展开，触犯道德规条者终要自食苦果。对物质欲望的态度也许是这篇小说最值得探究的地方。小敏对精美物品的由衷喜爱，既是以往被压抑的天性的自然质朴的流露，同时也还因为它们能够帮助她走出笼罩自己多年的外婆和母亲的阴影，商品的乌托邦寄托着她对生活的美好想像，这里面无疑有着令人感动的东西。但是，陈丹燕并没有像朱天心在《第凡内的早餐》中那样，从多重角度对商品乌托邦进行解构，而是轻易地把它纳入了伦理道德的框架中加以审视。在不可遏制的物质欲望的催眠下，小敏轻快地逸出了伦理道德所能允许的范围，令自己跌入到极其难堪的处境之中，连与安安의深厚友情也一并失去了。故事演进的前后因

果关系显然隐含着一种牢固的道德判断,即王安忆所点出的“人性的迷乱”。其实,人的物质欲望涵盖着深广的政治经济内容,欲望在特定社会时代里生成、呈现和得到满足的方式理应得到更加细致的关注,进而抽丝剥茧般地揭示个人幽深曲折的生存体验。倘若把物质欲望与伦理道德直接勾连在一块或是加以对举,就必然会忽略掉许多微妙复杂的意义生产领域,使作品流为简单而陈旧的道德寓言。

总体而言,上海卷中的作品对城市生活的开掘无论是在题材的广度还是在问题的深度上,都有着明显的欠缺。在这些作品中,上海的面目是如此的暗淡模糊,又是如此遥远,这难道就是我们生活其中的上海?上海在这些年里的变化给人们提供了多少丰厚的生存经验,其间所丛结的问题又是何其重大复杂,然而在上海作家的笔下,我们却无法真切感受到在上海的现实生活中涌动的暗流以及喷溅着疯狂气息的漩涡,文学与现实如此疏远,怎能不叫人备感失望?尽管由于选编者选择标准所限,这本小说集还不能反映出上海小说创作的全貌,但是它所呈露的上海作家的创作缺陷却是普遍性的。在我看来,上海作家在思想上的怠懒和衰老是造成这一切的症结所在,因为正是思考能力的迟钝和衰退,严重地限制了作家的观察力和想像力。以上海最出色的作家王安忆来说,这本集子虽然没有收入她的作品,但是她在编者序中反复申述的文学观,却是一种值得注意的症候。王安忆慨叹“在多变的事事里,景物都是缭乱的”,但她认为“在浮泛的声色之下,其实有着一些基本不变的秩序,遵守着最为质朴的道理,平白到简单的地步”,它们是决定事物运动方向的“永动的力”,也是艺术所要着力表现的。她强调文学应该表现日常生活里“平实,细致,活泼的人情味”,在这方面她更看好女性作家,女性的眼光“比较流连于具体的人和物”,不像“男性看世界,往往是大处着眼,对思想的期望过高”,她们的作品因而更有“肉感”,能够“袒露出生活的肌理”。在这里,王安忆明显表露了对思想的厌弃,却对小说中“肉感”的细节迷恋不已,她似乎相信生活的性质是恒定的,文学的任务只是赋予其“切实可感的肉身”。对生活性质的还原主义式的理解,实际上取消了文学探索无穷尽的人类精神状况的使命,文学的存在似乎只是为了用“肉身”印证一些永恒不变的生活性质。这种“肉感”

的诗学是极其危险的。小说应表现日常生活,这本身并没有错,但是日常生活并非自我呈现的,在不同的思想视野中,它所展露的内蕴是迥然不同的,在放逐思想之后,怎能保证对日常生活的描摹不会停留在“浮泛的声色”之上?王安忆似乎相信作家的直觉的力量,凭着这种直觉,作家能够“抵达事物的深处,焕发出思想的光芒”。然而,从这本小说集,我们已经看到这种所谓的直觉是何等的靠不住!其中的一些作品也许具有王安忆所称赏的“肉感”,却没有肉中之骨和奔涌流淌的血脉,这样的“肉感”只是脂肪的堆积,它恰恰暴露了作家思想的溃败和衰老。在香港、台北文学的对照下,这个问题更是显得触目惊心。我们希望上海的作家能从这套“三城记小说系列”看到自身差距,找到问题所在,在后续的几辑里贡献出令人信服的作品来。

二〇〇一年十一月于复旦

经典印象

新的光源

李庆西

劳伦斯是那种很难与世俗妥协的作家,英国人精神生活中的许多东西他都看不顺眼,而英国社会的许多事情更让他意气难平,所以写起文章来不但唧唧歪歪,还有股骂骂咧咧的劲头。他骂英国男人就知道过安稳滋润的小日子,不想负任何责任。骂摩登女子空虚的追求,而到头来是竹篮打水一场空。骂清教徒的禁欲思想造就了“性痴呆儿”,骂现代机器文明。他还嘲笑伦敦平庸的日常生活,挖苦英国的学校教育,培养的是循规蹈矩的“机器”……

这样的文章倒有舒心解气之效,读来浑身爽极,只是把人脑袋绷得紧

紧的。你甚至都来不及往深里去想,英国当年的事情跟我们现在有何干系,文字的魅力就是如此,这般深具批判力的犀利言辞很容易勾起宣泄的快感。当然,劳伦斯骂得并不粗鲁,别看这位矿工的儿子存心跟有钱人过不去,却丝毫没有“我是流氓我怕谁”那种腔调——他对一切文明痼疾的批判,恰恰基于人类最深刻的文明意识。若是把他那些挖苦中产阶级浅薄势利的话题引申开去,比量一下我们周围的现实,恐怕也少不了英国人那些毛病。

劳伦斯笔下有着抹不去的悲观色彩,可是他心中的理想却从未泯灭。他说,“今天,漫长的基督之火行将熄灭,我们应该在自己身上找到新的光源。”这是面向未来的宣言。

城 · 市 的 多 · 边 · 故 · 事

刘 建 梅

近几年，地域意识逐步走进了文学想像。用现在时髦的西方理论来解释，地缘想像、身份认同，以及城市记忆的崛起当然是为了抵制资本主义全球化所带来的单面化与普遍性。然而，我觉得地域意识和全球化是一个钱币的两面，谁也缺不了谁。换句话说，地方的意义来自全球，而全球的意义来自地方，它们既互为参照系，又互为困境。我们所说的资本主义全球化的矛盾不仅表现在新的霸权形式上，也表现在地域意识与这一霸权形式既对抗又合作的关系上。在这种新的语境下，文学又能做些什么呢？当作家们不再受地域限制，可以通过电讯网络与各种现代交通工具自由地在地球村漫游时，他们的文字是否还可以代表某一城市？如果可以，又代表这一城市的哪一部分以及承载这一城市的哪一段历史和记忆呢？如果文学已经被影视传媒挤压到了文化工业的角落，变成了朱天文所说的极其个人化的“奢靡的实践”，那么这一实践又在多大的程度上能塑造地域意识呢？

上海文艺出版社去年七月出版的《三城记小说系列》中，王德威教授编了一本台北卷，许子东教授编了本香港卷，作家王安忆编了本上海卷。把这三个城市放在一起，显然为城市学的研究又增添了一个新的视野。但是，在我读这“三城记”系列之前，心中一直有个疑问，那就是为什么北京未被列入其中？想当初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轰轰烈烈的“京派”和“海派”之争时，台北和香港尚属“边缘城市”，现在它们却在全球化的格局下举足轻重，让我们不能等闲视之。不过遗漏北京，也不是没有道理，因为香港、台北、上海这三个城市实在有太多的共同点：首先，都是国际化的大都市，都有库哈斯（Ren Koolhaas）定义的“通属城市”的特点，即拥有国际都市共同通用的模型，如机场、酒店、高架路和摩天大楼等；第二，多多少少都积淀了殖民或半殖民的历史经验，而现在又一下子跨入了后现代与后殖民的“全球化”时代；第三，它们的文化遗产、记

忆与创新走的都是近于“海派”的路子，相对于纯朴厚重的“京派”，显得“轻”与浮华。

这三本集子中，最“华丽”的世纪末城市要属台北，用编者的话来说，“世纪末台湾文学集张致与感伤，华丽与荒唐于一炉，在在展现了不同的面貌。而此一奢靡实践的地标，正在台北”。所谓“华丽”不仅是令人眼花缭乱的商品名牌、灯红酒绿的色欲纵横、疯狂呐喊的政治狂热，以及杂乱多元的台湾身份，而且是这一“华丽”表象后面的心灵溃散，一种到了“极致”后的“溢美”与“溢恶”。这华丽仿佛建立在废墟上，随时都有毁灭的可能。在这后现代化的都市里，白先勇笔下那些身在台北却充满乡愁与放逐心态的“台北人”已成了过去，就连朱天心《古都》中那个拾捡历史残片的忧郁怀旧的中年女人也与那个喧嚣的城市格格不入，而领新时代风骚的则是新新人类——他们既不眷恋祖国故土，也不眷恋台北的历史古迹，既不在乎复杂的台湾意识，也不在乎缠绵悱恻的情爱，能够捕捉住他们灵魂的惟有“第凡内珠宝”。朱天心的短篇《第凡内早餐》中代表新人类的“我”，面对着光灿夺目的世界名牌钻石，“以右手拈起它，并以情人的款款深情之姿缓缓套在左手的无名指上，心中涨满了宁静的快乐，仿佛，仿佛那个偶然在南非橘河河畔玩耍并拾获了 EUREKA 的小男孩。”（台北卷，25 页）然而，这一甩掉了沉重的历史与政治包袱、不相信感情而只漂浮在声色欲望之中、崇尚物质品牌的新人类又何尝不是后现代“通属城市”的一个“通属景观”？我们在卫慧、棉棉的小说中不是同样能找到类似的“新人类”吗？如同《上海宝贝》一样，透过全球化的计算机网络，“新人类”一边给自己挂上后殖民大都市的地域标签，一边又把这地域中的特殊风光当作可以消费的商品。无论第凡内钻石如何光彩诱人，它的光影与华丽实际上无情地抹煞了台北独特的文化记忆与身份认同。

台北“华丽”的另一景观是色相驰骋的颓废狭邪城。首先，同性恋之间的感情纠纷早已成为台北日常生活的一部分，算不上世纪末的台北怪谈了。纪大伟的《嚎叫》和曹丽娟的《童女之舞》都大胆地触及了同性恋感情、身体欲望与都市的关系。其实，这还构不成多少“震惊”效果，真

正令人震惊的是这个城市的性与革命的挂钩——泛政治化与泛性化的结合。如朱国珍的《夜夜要喝长岛冰茶的女人》为我们展示了这样一系列触目惊心的城市风景：夜夜泡酒吧的亚维依用男人的精液当面膜，兄妹同时与哥哥的同性恋男友结婚，庞大的人群沸沸腾腾地参与革命，妓女摇身一变成为立法院长，亚维依后又变成富可敌国的女商人。在这个个人与集体的情欲乌托邦中，台湾命运，私人生活，充斥着利比多的意识形态——一切都在肮脏的污水中漂浮，而整个城市即将在淹水中沉没。朱国珍用超现实的手法在小说结尾不仅预示了城市的即将沉没，并暗示了这一沉沦没有任何被救赎的可能：

在混沌不明的黑潮之中，这个婴儿像天使般降临，他丝毫不畏惧大水的污浊以及来势汹汹，任性悠游于浪波里充满喜乐；亚维依甚至不排除婴儿有对她说话的可能，因为这个婴儿的存在太超乎人类的想像力。（台北卷，108页）

当亚维依发现那个婴儿的脸就是她的脸时，惟一被救赎的可能在一刹那中变成幻影：连一尘不染的婴儿都在随波逐流，这个城市怎么可能不沉沦？

怀念与哀吊逝去的古典气息是朱天心的《古都》的主题。叙事者“我”是一位中年女性，无法像她的丈夫在台湾的本土意识里找到激情与认同，因为她属于外省人。当她年轻时代的好友A约她到日本京都相会时，她欣然赴约。在等待好友时，她流连于京都，发现这个城市并未丢失川端康成长篇小说《古都》中的古典气息和韵味。她后来因为好友爽约而提前返台，故意以“异乡人”的身份重新游走台北。随着她穿街走巷的脚步，被时代遗忘的历史记忆一点点被挖掘出来，然而她却永远也找不回古都所拥有的神韵与古典气息了。朱天心的这篇小说在全球化的版图中尤其显得弥足珍贵，因为她将地理与历史、考古与回忆叠映在一起，为台湾“殖民”史前的古迹刻了一幅独特的地图。王德威先生在给朱天心的小说集《古都》写的序中，曾把朱天心与她的叙述者们比喻成“老灵魂们”，“老灵魂以其世故犬儒，作为天下无道，兼亦‘反抗绝望’的方法”。他读出了“老灵魂们”有如本雅明所说的“天使背对未来”的一面，在断井残壁间寻找被都市化抛弃的过去，但他也看出“老灵魂们”世

故犬儒的一面，其“假先知”的姿态更显出台北末世中知识分子内在的矛盾。

不过，当朱天心把古典韵味提升到无法还原的美学高度时，她自己作为“外省人”的写作立场却无处隐匿，反而成了现实而迫切的征候所在。毫无疑问，她对所谓“原本真迹”的挖掘是对认同本土意识却无力保存本土文化遗产的人们的反讽，如黄锦树所论述的，“都市化——持续的，不可避免的都市化让本土论述奉为命根的台湾性也在世界化的过程中被抽离、分割，而失去了物质基础。”（黄锦树，《从大观园到咖啡馆——阅读/书写朱天心》）然而，朱天心对古都唯美般的怀旧，不可避免地略去了台湾殖民史中压迫与反抗的真实的历史。殖民史中的每一处断墙败柳并非那么富有“诗意”，相反的，却暗含着知识与权力、身份与种族之间种种冲突的历史经验。从朱天心的独特的身份认同和写作立场来看，她对过去的吊亡与怀旧无法掩盖或取代现今“政争惨烈丑陋的海岛”，因为这海岛的惨烈斗争可以一直追述到她所眷恋的残破的历史断层与积淀里，是古典气息所无法遮盖的。于是，她惟有自我放逐，在自己熟悉的城市中做“异乡人”，而这种自我放逐注定是悲剧的：因为她在历史中找不到“家园”，在现实的台北也找不到“家园”，在女性的世界中同样还是找不到“家园”。

王德威先生编的这本集子给我最深刻的印象就是这种“无家可归”的感觉。整个集子显示出了后现代台北的“华丽”，但却以“华丽”建构“荒凉”。全书弥漫的荒凉心态与华丽的都市景观形成了巨大的反差，在张爱玲“苍凉”的废墟意象上添加了一层夸张的狰狞之色。这巨大的反差中，个体如碎片一般七零八落、面目模糊，隐伏在都市里幽暗的角落，偶尔有几个“老灵魂”唱着不再天真的挽歌，为处于毁灭而不自知的人们唱着具有蛮荒色彩的挽歌，试图唤回已经失落的记忆。

香港在许子东教授编的集子里可谓是一个最“健忘”的城市，我们在这个城市里没有找到多少属于它自己的足迹与色彩，所谓“香港身份”在这个健忘的城市中如同那一堆弯弯曲曲缠在一起的输水管，既苍白又令人恐惧，而这些输水管在城市的建设发展中很快就不留任何痕

迹。许荣辉的《心情》把这个城市的健忘症表现得非常精彩。叙述者“他”面对着充满历史感的铜像却发现这个城市“无历史”：

其实他并不懂历史，好像是天生的缺陷。一来到这座城市他就感到他一直生活在一个没有历史感的环境里，而且后来他隐隐觉得，历史虽然还不至于是一种禁忌，却也总叫人不愿想起、提起，就是这么种氛围一直围绕着他。（香港卷，2页）

可笑的是，不懂得历史的他，为了生活，却写起历史题材的剧本来了。于是，在老板的压力下，他一遍遍地改写着面目全非的历史，只是为了讨好观众，为了商业效果，根本没有办法顾及历史的真实性。老板对历史的阐释典型地代表了后现代的影视文化无情“消费”历史的现象：“历史是成年人开的一个大玩笑，已被无数谎言掩盖，历史很大程度上是胡捏的，没有人能找到完全的真相，我们何不在那血迹斑斑的史迹里也胡捏出一个娱乐人的故事来？”显然，香港在消费“历史”的同时，自己都市的历史也一并被“快感文化”与“娱乐文化”所吞噬了。全球化迅速地把商品消费文化带到世界的各个角落，通过后现代影视的“快感文化”无情地涂抹掉地方性的历史和记忆，生活在狭小空间的“他”，又有多少力量能抵挡这种一致性的“涂抹历史”的批量性生产呢？相对于不真实的影像世界中的历史，叙述者的母亲则代表着香港日常生活真实的一面：她属于这个城市里最廉价劳工的一群，一群默默支撑着香港繁荣，却最容易被时代遗忘的底层香港人。只有在他母亲这类坚忍地生活着的平凡人身上，他才仿佛找到了一点点与香港历史有关的东西。可悲的是，后现代的香港只生产那种虚假的历史，象征着真实的香港历史的母亲早就被商品社会无情地遗弃了。于是，在这个“健忘的”城市里，个体被都市化的进程所异化。

最近香港学的兴起实际上是对这种“健忘症”的抵抗。西西早在一九七四年就先知先觉地写了《我城》，但是大多数香港人则在一九八二年中英两国谈判香港前途时，才发现这个“我城”，才开始寻找“我是谁？”的答案。香港“九七”回归前，再现香港的书写文字与虚拟的影像世界交叠，一次次地书写、复制和消费着游离于殖民与后殖民历史中的香港，而这些再现香港的文化生产，却常常让人无法确认哪些是真实的历